

工地無國界： 尋找工殤紀念碑裡的移工

顧玉玲

國立台北藝術大學文化資產與藝術創新研究所博士生

摘要

來台移工擔負困難、辛苦、危險的勞動，職災死亡率遠高過平均比例，但他們的付出可曾留下足以佐證的歷史記錄？本文檢視台灣自 1990 年引進移工以來的工殤碑，透過文獻及新聞搜尋分析、現場實地探勘、連絡訪查建碑單位，以確認碑址、碑文及立碑由來，目前共計確認五個工殤碑留有移工姓名。

從明清治理、日本殖民、到國民政府來台，台灣的重大公共工程結束後建碑祭祀總伴隨著對工程成果的禮贊，既是撫慰亡者犧牲，也維持了政權擴張的合法性。來台移工被政策性地排除在台灣的國族認同之外，紀念移工就挑戰了原有紀念碑內含「為國犧牲」的政治意涵。移工工殤碑的基進政治性，就在於其揭露全球化的不平等：獲利的跨國財團並非公共利益，受害的東南亞移工也不是為國犧牲，營造工地上的勞資剝削早已跨越國界。

關鍵字

移工、工殤碑、營造工地、職業災害、集體記憶

台北 101 靠信義路的購物商圈，人潮一波又一波，假日時尤其熱鬧，法輪功、台灣國的看版與旗幟熱鬧地各佔一方。同時間，觀光客、行人、逛街的人多在商場與辦公大樓間的戶外裝置藝術前拍照，其中，佔地最廣、由七塊巨型七彩琉璃牆所組成的「伙伴碑」最引人注目（圖一），招來大嬸團在碑前集體比讚入鏡，或是年輕情侶在七彩牆前甜蜜自拍，交錯明亮的彩光總成為觀光焦

點。

也有人拍完照好奇轉身探看，鏤刻在七彩琉璃碑上總計上萬個人名，密密麻麻，大半是中文，但其中也不乏羅馬拼音，有的姓氏一看就是西方人名，有的則複雜多節，唸起來倒像是島上已然熟悉的泰勞或印勞的名字。難道竟然有東南亞移工的名字被刻在台北最繁華的商圈、最高聳的大樓前嗎？好幾次，我聽見觀光客的對話如下：

這應該是捐錢蓋大樓的人名吧？

前面那一塊是死掉的人，後面這些還活著，導遊說是對蓋大樓有貢獻的人。

也有外勞嗎？這是哪個國家的外勞？

討論，就是關注的起點。有這個起點，就有展延集體記憶的可能性。這篇論文聚焦於散落在台灣各地的工殤碑中，¹有多少移工的身影？²他們在跨越國界的流離勞動中，如何被接收國的歷史所記憶或遺忘。

一、來台移工的文化生產與在地交流

台灣早在八〇年代就已出現藍領移工散布在各產業間，1989年為配合十四項重大建設工程及六年國建計畫首度以專案輸入營造業移工，至1992年就業服務法公布實施，才正式引進大量產業及社福移工（李易昆，1995；劉梅君，2000）。此後一直到現在，無數低階、藍領的勞動者在台灣國界間遷徙來去，若不計入因政策限制導致人數日增的無證移工，³在台移工人數已逾

- 1 「工殤」二字由工傷協會、工委會於1993年秋門遊行首度提出，借用皇帝駕崩的「殤」字以表示居高不下的職災率導致工人嚴重傷亡，是國之殤。俟後職保法立法也直接使用「工殤」入法，確定四月二十八日為工殤日。影響所及，主流媒體也逐漸挪用至重大傷亡事件，如風殤、震殤、核殤等。工殤碑指的是為職災死亡勞工所設立的紀念碑。
- 2 Migrant worker，台灣官方翻譯「外籍勞工」，民間與媒體也習慣此一用法。本文以「移工」取代「外勞」，以茲正名。但涉及官方制度性創造出來的慣用指稱，如外勞政策、逃跑外勞以及民間口語稱謂，仍沿用官方說法，以突顯其荒謬性。部份陳述為了與本地工人區辨，會套用「外籍」二字。
- 3 無證移工（undocumented migrant worker）在台灣被官方及主流媒體稱作「逃跑外勞」，意指那些因不得自由轉換雇主而選擇逃離原勞動位置，或因居留期限到期而不告而別移工，其合法身分一旦被雇主或仲介單方面通報「逃跑」，立即成為非法身分。至2017年二月底，勞動部公布「產業及社福外籍勞工行蹤不明概況」統計，共有52,904人。參見 <http://statdb.mol.gov.tw/html/mon/212070.htm>。2017/08/13。

六十五萬人，⁴ 佔整體台灣就業人口的 5.5%。⁵

超過四分之一個世紀，來自東南亞的移工在台灣の工地、工廠、漁船、看護機構及個別家庭裡工作，承擔了最辛苦、最危險、最骯髒的勞動。但由於政策與語言的隔閡，接收國多半只視其為低廉的「勞動力」，而看不見「人」の面向。

移工承載了母國的文化教養，來到台灣工作，也在當地消費、生活、愛戀及創造。長久以來，移工社群間早已依興趣及地域而組成詩社、樂團、籃球隊、禱告團、同鄉會等各式組織，自發地進行內部連結（吳挺鋒，1997；吳佳臻，2008）。此外，各種結合廣告或宣傳の東南亞各國母語刊物，或自發性的文學創作出版，也協助移工以母語接收資訊，累積勞動生涯外的文化發展（宋家瑜，2017）。他鄉異地，有限的條件下，東南亞商店、教會、小吃店、匯兌銀行、海外包裹郵寄等，都成為移工連結資源的重要據點。他們從來就不只是勞動力。

相較之下，由資源優勢の在地人主動出手，公開搭建與移工の跨文化交流，就晚了將近十年。移工大量進入台灣多年後，官方及民間團體才漸次發動不同形式的文化交流以促成相互理解、豐富多元文化內涵。公共電視及中央廣播電台因應婚姻移民的需求，率先使用東南亞各國語言開立節目。各地方政府也慢慢推動東南亞美食、文化等活動。2001年，台北市政府勞工局主辦「台北請聽我說！」外勞詩文選，找在地作家擔任評審，並公開展演及印製得獎作品，連續九年，留下精彩的移工詩文記錄（成露茜，2008；台北市勞工局，2010）。2006年起，「四方報」陸續推出各國語言の平面刊物，獲得許多移工／移民主動投稿，繪畫與詩文創作都留下可觀的記錄（張正，2008：17-18）。此外，移民、移工權益倡議團體也紛紛以攝影展、出版詩文書、「唱自己的歌」工作坊、紀錄片工作坊等方式，進行對內組織移工、對外與台灣人交流的文化活動，建立「我群」の文化主體（顧玉玲，2010：152-157）。

4 根據勞動部の勞動統計查詢，至2017年六月底共有產業外勞410,000人，社福外勞243,804人，合計共653,804人。參見<http://statdb.mol.gov.tw/html/mon/212010.htm>。2017/08/13。

5 至2017年月底全台就業人口計有11,337,000人，若以同期移工數653,804計，則估計移工佔5.5%。參見<http://statdb.mol.gov.tw/html/mon/22010.htm>。2017/08/13。

2014年推出的「移民工文學獎」，更由本地人募款、主辦，定位為「為東南亞裔在台新住民（外勞外配）所辦的文學獎」，⁶鼓勵母語創作。翻譯評審的過程雖不免流失原有文字的美感，但也罕見地在台灣各式以「美文」為主流的台灣文學獎中，成為聚焦內容的深力度凌駕書寫技藝的文學獎，拓展台灣文學的向度，將異鄉人在此的生活經歷納入台灣在地的社會發展，肯認其重要性與不可或缺，打開在地文學既有的侷限。

上述種種交流實踐，既是回應移民／移工的主體需求，也是企圖與台灣社會對話，不讓移民、工的付出成為當代台灣歷史的空白，也不讓多元異質的文化交流被輕忽、遺忘。以藝術再現作為自我表述的方法，來台移工才不會被簡化為經濟發展的統計數據。

然而，除了生動活潑的生命交流，移工在勞動現場的慘烈傷亡，也是不可忽視的現實黑暗面。過往二十餘年，台灣的公共建設、製造生產與社會照顧，無一沒有移工的血汗付出與貢獻。這些藍領移工散落在製造業、營造業、3K產業、漁業及照護產業，職災死傷的比例也遠超過本地勞工。根據江旻嫻等人（2016）針對勞保職災給付的數據進行的調查比對，發現2005年至2014年間，產業移工的職災死亡千人率以1.6–2.4的倍數遠高於本國勞工，且移工死亡的平均年齡為32.82歲，較本勞平均43.22歲年輕許多；至於勞保的死亡給付金額，前者只占後者的一半，平均是59萬：103萬，二者相差近一倍。

上述統計資料的差距指出移工在台灣工作的殘酷處境，已然令人觸目驚心，但進一步探究，這個數據恐怕還是嚴重低估了。首先，陳金泉（2002）的研究顯示，許多移工發生職災，由於不諳法令，若雇主為卸責規避職災認定，且利用司法單位人員不了解移工母語難以溝通，將原本屬於職業災害之事故轉為普通事故，則會造成移工家庭權益之重大損失。其次，人數高達二十四萬且日益增加的家務移工，⁷由於不適用勞基法及未達勞保強制投保規定，因此多

6 <http://2014tlam.blogspot.tw/>。2017/03/26。

7 家務移工在官方資料中為「社服外勞」，包含外籍幫傭及監護工。至2017年六月底，外籍幫傭佔1,939人，看護工則佔241,865人，總計243,804人。參見勞動部網站<http://statdb.mol.gov.tw/html/mon/212010.htm>。2017/08/15。

半只有健保而無勞保，在孤立且封閉的家庭勞動中，⁸種種身體及精神損害的職場傷亡也未列入勞保職災計算中。此外，無證移工的職災死亡也不在勞保職災指數中。根據曹常成等（2007）針對來台移工的重大職災分析指出，營造業死亡的無證移工就佔了移工總死亡數的 11.9%，若把這些因「逃跑」而未能納入勞保的移工加上，⁹移工死亡率遠高於平均值的倍數還會再增加。最後，台灣龐大的遠洋漁業成為「海上不休息的工廠」（李雪莉等，2017：101），船上有數以萬計的境外聘僱移工，¹⁰長期處於低薪、長工時、高風險的作業環境，卻不受勞基法保障也無勞工保險，自然也不在統計數字內。

上述四項客觀處境，都形成移工職災統計上的黑洞，實際情形遠比數字呈現的嚴重。其中，家務移工佔移工總數將近四成，卻在移工職災率的計算分母之外，更使得問題的嚴重性難以估算。但不管怎麼說，來台移工被推到重大職災的最前線，早已是不爭的事實。

來台移工在勞動領域裡的重大傷亡、血跡斑斑，除了冰冷且嚴重低估的勞保數據，除了倖存者的書寫、口述，又留下了什麼印記與警惕呢？

在台灣，紀念碑作為一種肯認歷史事件的具象存在。解嚴後各式紀念碑改建、新建，更反映了其作為歷史事實的直接證據。¹¹紀念碑原就是政治角力的結果，台灣勞工的貢獻原本就常被主流歷史忽略，更邊緣的移工要納入紀念碑，可想而知是十分稀少，相關研究也很欠缺，只能依靠大量搜集新聞、文獻資料，現場實地探勘，一步步找尋移工紀念碑的分析文本。

8 封閉指的不僅是空間上沒有上下班之分的家務勞動，更是指時間上經常全年無休的特殊處境，使得沒有同事的家務移工失去社會支持網絡，出問題或受傷害也難以對外求救。根據勞動部「105年外籍勞工管理及運用調查」顯示，家務移工全年無休者占 34.5%，超過八萬人！55.4% 則平均一個月休假 1.7 次，每次 8.9 小時。參見 <http://statdb.mol.gov.tw/html/svy05/0542analyze.pdf>。2017/08/15。

9 在台灣，多數無證移工並非偷渡來台，而是付了大筆仲介費、依合法的就業管道來台工作，「逃跑」的主要原因是不得自由轉換雇主及嚴格的居留年限（藍佩嘉，2006；顧玉玲，2010）。

10 根據報導者（2017：40）引用漁業署統計資料，至 2015 年就有 14627 位境外聘僱的外籍漁工，其勞動環境的惡劣被稱為「血汗漁場」。

11 我採用吳乃德（2008）對「歷史事實」、「歷史詮釋」和「歷史啟示」的分類，將歷史事實定性為真實發生過的事件。

二、紀念碑政治學

臺灣自明鄭以來，漢人渡海來台開墾人數遽增，致原住民生活空間縮減，雙方屢生紛爭，為規範原住民與漢人間的物權及事權，常立碑劃設界線以避免糾紛。之後歷經明清統治、日本殖民時期至今，留下記錄的碣碑已逾二千件（曾國棟，2004；何培夫，2001）。舉凡旌功頌德、災變殉難、政經建設、開疆拓土、禁制教化、宗教民俗、文教薪傳、社會組織、戰事遺跡、辟邪碑碣、展示意象及特殊狀況等，都可以立碑以為記。

紀念碑作為集體記憶的物質化呈現，都有其社會脈絡可尋。歷史記憶得以維繫一個群體的文化連續性，也得以建構單一的政治認同。統治者尤其需要創建有利的史觀以維持治理的正當性，進一步使其權力及財富都獲得合理性。從統治的角度來說，集體記憶是可以藉由具體的物件、傳播而型塑並加強的，隨之而來會決定了整個社會對事物的價值以及認同（Halbwachs, [1950] 1980；Sherman, 1994；王明珂，1993；王汎森，1993）。

隨著政權的變更，紀念碑也為統治者塑造、改寫歷史的重要標誌。以霧社事件紀念碑為例，1930年的霧社事件是日本統治時期最晚近的一波原住民激烈抗日行動，雙方死傷慘重，俟後，台灣總督府在霧社設立日本人殉難紀念碑。二戰後國民政府來台，推倒殉難碑改建原住民抗日紀念碑。1987年解嚴後，反對運動伏流出土，台灣各地方政府改朝換代時，莫不設立二二八紀念碑及紀念館，以達成打破威權、邁向民主化的象徵作用，也回應民間對重建歷史的需求（陳佳利，2007b；陳香君，2014）。也就是說，統治者為鞏固統治地位的合法性，經常以紀念碑的重建、新設，確定歷史正統，同時達到否定異己、肯認自我的雙重作用（顧玉玲，2008）。

Walter Benjamin 將歷史詮釋權視為統治者的文化財富，認為：「沒有一座文明的豐碑不同時也是一份野蠻暴力的實錄。正如文明的記載沒有擺脫野蠻，它由一個主人到另一個主人的流傳方式也被暴力敗壞了。」（2012：252）直指在勝利者的歷史裡，被壓迫者經常是噤聲隱形的。也就是說，主流文化與歷史敘事中，受損害者、邊緣與弱勢的基層民眾，經常不納入記錄，成為結構性的失憶。

長久以來，台灣營造業向來佔最高職災比例，工程艱困，死傷特別多，故而動土前多有祭拜神社亡靈，以利開工順暢的傳統，完工時也有敬天祭鬼以祇安寧的習俗。日治時期在殖民地建設水圳、鐵路等基礎工程，至晚期軍國主義擴張，更加緊建設電力、道路工程以備軍需，在誇耀工程成果的同時，也留下人員傷亡的慰靈碑，其中不乏因傷因病過世的日籍技師。1949年國民黨軍隊撤退來台後，龐大的軍士人員轉作開路墾植工作，冷戰時期縮減軍力更將眾多退役人員轉任榮工處，從事國家重大公共工程。那些在開路造橋爆破拓荒的過程中死於非命的榮民，多半隻身在台，同儕間也形成立碑悼念的傳統。¹²

自1989年政府專案引進營造業移工以來，台灣工地上客死異鄉的人更多了。曹常成等（2007）針對來台移工的重大職災分析指出，營造業移工佔總移工人數不到5%，但其職災死亡案例卻佔移工死亡率的40%。可想見台灣過去近三十年來的營造工地上，無一不是沾染了移工的血淚斑斑。

台灣公共工程的工殤碑上，外來的勞動者不會被遺忘，因為日本工程師是殖民母國的公民，國民黨軍隊榮民則有黨國餘蔭，統治階層為了安撫民心或工程同儕間的不捨與互助，都使這些遷移勞動者在碑文中留下最起碼的紀念，從而塑造集體記憶中常存感念，對犧牲者的感念也一併回饋到確定統治者的正當性。而逾六十五萬名來自東南亞的移工，雖承擔了台灣最基層的勞力貢獻，但其勞動權、社會權、政治權皆因階級及種族的弱勢，受到政策性的嚴重剝奪（曾嫻芬，2006；顧玉玲，2013），既沒有選票，也沒有長久居留的權利，在政治上也難以被現有政黨的國族主義所納編，在台灣歷史上更難以留下可供流傳的集體記憶。

Halbwachs（[1941,1952] 1992）認為記憶是可以挑選重組，而動機是現實的共同利益，即便是傳統，也可以因應現實的需要而創造出來。而民族歷史的敘事更是建構民族想像不可或缺的一環，族群認同的變遷，也是透過新的歷史記憶與遺忘舊記憶來達成（Benedick, 2008:217；王明珂，1997：375）。政權要求單一的認同，但勞動現場卻是族群雜混，於是在標榜單一政權成就的公共工程紀念碑旁，工殤碑卻呈現多元族群的真實歷史，也讓長期被輕忽的勞動階

12 榮民文化網／國建殉職英雄紀念碑，<http://lov.vac.gov.tw/Photo/List.aspx?c=8>。2017/03/26。

層留下足堪探究的史料。

三、來台移工的工殤碑索引

台灣以解嚴標誌邁向「政治民主化」的進程，同時也迎來新自由主義橫掃全球的年代。伴隨著政黨政治的解嚴，台灣社會面對的是勞動條件去管制化、國營企業私有化、廉價外勞政策等不利於工人的現實處境，以及台灣因應加入WTO 更加速開放資本自由化的國界門檻（金寶瑜，2005；Harvey, 2005）。

現實條件漸趨嚴酷，台灣自主勞工運動步步艱難。推動工殤碑的運動正是從最尖銳的勞工職災傷亡，突出勞動創造價值的意義，清算經濟發展的慘酷代價。檢視台灣 1990 年引進移工以來興建的工殤碑，先透過新聞索引及文獻資料的全面搜尋，再依著這些線索親赴現場實地探勘，與建碑單位連絡、訪查，以確認碑址、碑文及立碑由來，拍照並抄寫碑文。歷經漫長搜索，總算收集到台灣各地共五個工殤碑，留有移工姓名，其中二個的碑文還有以移工母國語言與中文並列。

以下簡要記敘這五個工殤碑，標誌建碑日期及明確地點，以作為未來深入研究起點：

（一）信義快速道路殉職碑，2006 年 11 月，台北市中強公園東北側

目前追查得到最早刻有移工姓名的工殤碑，出現在台北市中強公園內，位於台北捷運象山站二號出口東側，靠近信義快速道路終點。這個工殤碑主要是針對 2004 年北二高支線信義快速道路興建過程中，因灌漿不慎導致隧道施工鋼樑坍塌，工人當場被倒塌的鋼筋、鐵條、混凝土壓傷，二名泰勞及二名台籍工人送醫不治，另有多名台籍及泰籍工人遭受輕重傷（蘋果日報，2004）。

這個棕紅色的花崗岩紀念碑下，是二階梯式的圓型底座，包覆在一整個圓型的廣場內，四週植有林木，形成公園邊緣的獨立紀念空間（圖 1-1）。圓型的殉職人員紀念碑，由半人高的長方型底座支撐，碑面上分別以中文與泰文記述工殤事實（圖 1-2）：

殉職人員紀念碑

信義快速道路穿越象山及拇指山，工程艱鉅，施工期間，工程團隊運用智慧克服困難，終能順利完工，在此通車時刻，我們特別感念於93.3.23 襯砌崩坍事件不幸殉職的四位工程人員，特此對殉職者之貢獻至上最高敬意。

周福亮（台北縣中和市人），1958.04~2004.03 / 李文興（花蓮縣花蓮市人），1965.10~2004.03 / KHOMKRIT SIRIPHONPRIDA，泰國猜也奔府，1959.06~2004.03 / PHOM KLAUYTONG，泰國素琳府，1963.07~2004.03

台北市政府工務局敬上 / 中華民國九十五年十一月

北二高的信義支線，全長三點二公里，南起北二高台北聯絡道的萬芳交流道，向北穿越拇指山、象山，北至中強公園與信義路五段交會。由於一連穿越兩座山，隧道分為南北二段，二段隧道中間又跨越山谷建立一百零五公尺長的高架橋。工程艱鉅可想而知。在這個追思廣場的入口處，另有一座方型黃底黑字的方型工程紀要碑（圖 1-3），也是高工局落款，日期為 2005 年五月完工通車時，說明信義快速道路穿越台北市東南方，連接文山區與信義副都心，「不但縮短兩地行車距離，減少辛亥路、基隆路之車流，更可促進木柵、深坑及石碇地區之發展，通車之日感念各界士紳之支持及工程人員之辛勞與犧牲，特為此誌。」

但殉職碑卻遲至 2006 年十一月才設立，到底是為什麼呢？

新聞上查無揭碑新聞，不過殉職碑的後續效應數年後出現了，在馬市長成為馬總統直至卸任後一再被反覆提及，在文獻中留下蛛絲馬跡，得以循線搜查。最早的新聞出現在 2013 年十一月台北捷運信義線的通車典禮上，時任總統的馬英九在同黨市長郝龍斌的陪同下，特地試乘捷運至象山站帶領大批記者來到這個鮮為人知的殉職碑前，說明當年信義快速道路崩塌事件後，馬市長除要求北市府增加死亡補助，也「要求應以泰文撰刻紀念碑，除象徵臺北市有偉大城市的高度，也讓大家知道臺北市將所有的外勞及外籍人士當成自己市民一

般看待。」（中華民國總統府，2013）為感念殉職工程人員的犧牲、奉獻，總統與各政界人士在紀念碑前行三鞠躬禮，以表達追悼（郭美瑜，2013）。此後，這個泰文工殤碑陸續又在行政院高階文官的結訓典禮（唐詩，2014）和東南亞書店「燦爛時光」座談會（仇佩芬，2016）被一再提及以作為其任內尊重移工的政績。

合理的猜測應是，依照營造業慣例，工程碑與殉職碑同時落成，但在馬市長要求加上泰文翻譯後，新工處又重新打造了殉職碑的中泰文併置新碑面，並通知泰國辦事處，才有之後的泰籍罹難移工的家屬寫信向馬市長致意的情事（郭美瑜，2013）。因此，殉職碑直至信義支線通車一年半後才設立，開始被媒體報導則是工殤十年之後的事了。

如今，中強公園臨近象山步道，運動登山人口不少。這個碑別開生面增加泰文翻譯，恐怕也是台灣至今唯一一個以母語書寫工殤移工姓名的碑。可惜中泰文併列應非原本的設計，故而碑面的字跡小而間距擁擠，燙金淺刻的字體在揭碑後十年也未再加強整修，已然字跡斑駁、難以辨認了。

（二）雪隧殉職碑，2006年6月，新北市北宜高速公路石碇服務區

位於北宜高石碇服務區的工殤碑，全名為「北宜高速公路工程殉職紀念碑」（圖 2-1），除了記錄十三名殉職的台籍工程師及勞工，也留下十二位泰勞的拼音姓名。

北宜高速公路也就是國道五號（俗稱「雪山隧道」，本文以「雪隧」簡稱），由榮工公司承建，被大英百科全書列為全世界最難施工的隧道之一。雪隧於 1991 年七月開工以來，歷經多次災變，終於在 2006 年六月全線貫通。通車前夕，工傷協會、工委會至交通部陳情，要求重大公共工程應立碑紀念職災亡者，且立碑過程應納入家屬意見（大紀元，2006a）。

2006 年六月十五日，雪隧全線通車典禮，由三位歷任行政院長蘇貞昌、游錫堃、謝長廷，以及交通部長郭瑤琪、新北市市長周錫瑋共同出席工程殉職紀念碑的揭碑儀式，且邀請殉職人員陳春展、黃教達等家屬代表，以及泰國駐台代表，共同獻上白色的玫瑰花，以表達對亡靈的敬意（大紀元，2006b）。

這個工殤碑的碑文如下（圖 2-2）：

北宜高速公路工程殉職人員紀念碑文

雪山嶙峋，霧濃靄重，自古難行。

民國八十年，啟建北宜高速公路，穿崖越壑，台北直抵蘭陽。雪山隧道，十二點九公里，最是艱難。幸賴國道英雄，突破險阻，鑿出曙光，歷時一十五年，豁爾貫通，大道康莊。惟哀慟林子益等二十五位，大功未竟，遽爾犧牲。泰籍友人，辭親千里，死別何忍，生離已傷。首任處長，郭公榮松，勤於任事，積勞成疾，雖轉任而辭世。夫今建設功成，緬懷渠等，功勳勳朗朗，恩德流長，奚立碑以懷仰。

本國籍：林子益、王正和、吳忠勇、倪義雄、許銘甫、陳耀西、陳春展、黃教達、楊德智、劉明輝、蘇春發、嚴聰來

泰國籍：LANA PRAYOON、PHONHAN BUNPAENG、
THONGJAE M NATHAPHON、THABTHONG PHONGSAKORN、
JITWILAI CHAIYASIT、PHONGPRASIT PHYAKKHA、THU-CHIYA
SRIRAK THUI、NAEOPRASERT KONGMA、WANGTHAPHAN
PHICHAI、PRKRCHA RATANATHIT、CHAROENPOKASUB
PRAPHUN、CHUEASAPHANG CHAROEN

交通部臺灣區國道新建工程局謹立／中華民國九十五年六月

依據國道新建工程局的資料顯示，最早殉職的泰籍勞工 LANA PRAYOON 於 1998 年在頭城收費區排水橋墜落死亡，繼之，有人於隧道開挖工程遭落盤壓死、有人連車帶人衝入石碇溪河床、有人在隧道鑽探作業時遭 TBM 全斷面隧道鑽掘機捲入、或有人在裝料作業不慎意外死亡。而在拆除石碇高架橋墩版模作業的四年間，就有三名泰勞墜落死亡（同上）。數字上看不到的，還有更多人因工程環境、壓力及勞累造成呼吸系統疾病和外科傷害（維基百科，無日期）。

這個工殤碑位於石碇休息站後側的停車場旁，緊鄰遊客餐廳，有花園造

景，算是能見度頗高且紀念園區完整之處，只是過客行色匆忙，用餐後少有至後花園停留探看。碑體以雪山隧道南口的四稜砂岩為材質，記錄這一段施工最困難的四稜砂岩區剪裂帶與斷層帶。側面的工程紀要說：「此一跨世紀工程不僅為台灣隧道工程史、在世界隧道工程中上均寫下重要的一頁」（圖 2-3）。事實上，雪隧開挖期間爭議不斷，特別是其穿越雪山山脈六處斷層帶、九十八處剪裂帶、三十六處地下湧泉，不僅施工艱困，也恐造成環境浩劫。而為了克服異常堅硬的四稜砂岩層，施工單位花了十億量身訂作 TBM（全斷面隧道鑽掘機），卻挖斷了上新斷層中萬年水脈，導致西行線崩塌，機器被壓毀直接報廢，多次石盤崩塌而因此造成十數名開挖工人工殤死亡（互助營造，2010：217-218）。動工之前，環保團體對雪隧破壞生態一直懷有高度疑慮，開挖後各種問題接踵而至，付出性命代價以「克服難關」的，都是最基層的工人。

工程險厄並非不可避免，違逆自然成就了「隧道工程史重要一頁」，到底成就了誰？被迫赴險勞動以「克服難關」的都是最基層的勞工，甚至付出性命代價的多是千里而來的廉價移工。

（三）台北 101 伙伴碑，2007 年 4 月，台北 101 大樓至購物商場間信義路側

台北 101 大樓信義路側，2007 年豎立了七面各三米高、二米寬的彩色琉璃牆所組成的紀念碑，以多色的七巧版拼湊成牆面，正反面都鏤刻人名，共計上萬名。

這七座彩色的琉璃牆組成工殤碑，紀念六名職災辭世的工人及所有參與高樓建設的勞心勞力者，命名為「伙伴碑」。距離購物商場最近的第一塊琉璃上，碑文以中英文書寫：

從這裡延伸出去的

每一角落 每一片段

都有勞動者用生命刻劃的軌跡

獻給所有親身參與 TAIPEI 101 的伙伴

並紀念因工往生者

林建成、孫同英、陳又禎、陳信陽、陳錦水、張達全

台北 101 樓高 509.2 公尺，總樓層計有地上 101 層、地下 5 層，於 1999 年動工，2004 年底完工，正式啟用時是全世界第一高樓。大樓施工期間，時值 2002 年 311 大地震，林建成等五名工人自高樓墜落身亡。這個悲劇震驚台灣社會，彼時協同工殤家庭善後的勞工團體¹³公開向官方要求建立完善的安衛勞檢制度，並提出就地建立工殤碑以作為未來警惕。經長達四年的勞、資、政三方協商，工殤碑最後以「伙伴碑」命名，將參與建設的出資者及勞動者總計逾萬人的名字全部刻在碑體上，這些人可能是大老板、設計者、行政秘書，也可能是鐵模工、電纜工、清潔婦；他們也許是來自花蓮的原住民，也許是飄洋過海的移工。而 311 地震身亡的五名工人及次年因電梯作業感電往生的工人張達全，總計六名工殤亡者，則名列第一面碑，以示悼念，作為日後預防職災的警惕（顧玉玲，2008）。

台北 101 工殤碑完工於 2007 年一月，但正式揭幕則到同年四月二十八日工殤日才落成點燈。這場揭碑典禮沒有達官貴人，由工運團體主辦，邀請工殤家屬、工傷者、移工、工會幹部共同參與（苦勞網，2007）。選擇在夜間舉行揭碑典禮，一來突出夜光自七彩牆內迴照而出的燦爛效果，十分耀眼吸睛；二來也是為了招待家屬及移工一起登上八十九樓的觀景台，眺望台北市燈火輝煌的美麗夜景——這對很多移工來說，都是第一次恐怕也是唯一的一次，畢竟，台北 101 是他們平日不敢奢想消費的地方。

工殤碑最後一塊琉璃牆，正面鏤刻了當年勞資政協商碑文時未曾出現的字樣：

此時此刻／依然有眾多的伙伴／追循前人的軌跡／繼續著台北 101 的
故事／一個永不結束的故事

以意義不明的文藝腔收尾，立即將第一塊碑的沈重悼念，稀釋至如風輕揚。而背面排列出這座摩天大樓的出資公司及建造團隊，其中不乏本土大財團及國際營造商，最下面則列名共同建碑團體，含設計及勞工組織。

至今，伙伴碑應該是台灣各式紀念碑中，人潮聚集最多的一個。它位於世

13 根據最後一塊碑的背面建碑相關團體，可看出從頭至尾持續參與的勞工團體，總計有工傷協會、工委會、北市產總等。

貿捷運站出入口，色彩繽紛活潑，是台北 101 最大型的裝置藝術，戶外導覽的重要景點，也成為日後觀光旅遊團來採購時必停駐拍照之地（圖 3-1）。我多次跟隨觀光團的三角旗聽過幾次導覽，導遊多在第一塊碑前簡短敘述六名工殤者，再繞至第二塊碑要大家抬頭看列在第一排的姓名，依次是陳水扁、馬英九、陳敏薰、焦祐倫、陳鴻等台灣政商名流（圖 3-2），再適時穿插前總統入獄新聞以增加導覽的俏皮時尚感。隨後請觀光客自由拍照留念，七彩碑總是熱門拍照點。

2017 年春天，雖說陸客銳減，但我還是在假日傍晚的台北 101 遇見三團觀光客。其中一團是越南人，穿著較為樸素卻明顯已是越南新興中產階級，多是青中年，扶老攜幼的海外旅遊親子團。我因此特別在七彩碑上萬個名字中找尋越南名字，未果。倒是經此查詢，我才意外發現，為數佔了將近五分之一的羅馬拼音姓名，其實有一半是明顯的英語姓名，而非我以為的泰籍工人（圖 3-3）。當年協商勞工團體雖強調要放上移工姓名，但名單由各建設公司出示，恐怕多數公司還是優先排上日本、歐美高階主管與工程師，真正的移工姓名應是遠不如他們在工地現場所佔的勞動比例。¹⁴ 一如原先協商姓名排序時，資方代表承諾由電腦隨機排列，最後卻是將全政商名流有志一同地排在首塊磚牆的第一列。¹⁵ 即便是工人抗爭多年而來的工殤碑，終究還是被資方以階級、種族篩選過紀念名單。

（四）外籍勞工工殤碑，2007 年 4 月，台北市承德勞動文化園區

這是特別針對移工設立的紀念碑。2007 年四月二十八日，台北市政府勞工局在台北市承德勞動園區內，別開生面設立移工工殤碑，紀念 1991 年迄今來台北工作並職災死亡的二十六名移工，取名「四面八方碑」（圖 4-1），以感念來自泰國、越南、印尼、菲律賓四個國家的移工，為台北市的付出與貢獻。燙金色的碑文同時以中文、泰文、英文（菲律賓官方語言之一）、越文與印尼文呈現。主碑文（圖 4-2）如下：

14 一般而言，營造業移工約佔總勞動人數的三分之一。

15 姓名排序的鬥爭，詳見顧玉玲（2008）。

外籍勞工工殤紀念碑

謹以此四面八方紀念碑，感恩於 1991 年迄今在台北市因為職業災害而奉獻出強壯身軀、可貴生命的外籍勞工朋友們，這群可敬的朋友名字將被全體市民永誌不忘！

臺北市政府勞工局謹誌／中華民國九十六年四月二十八日

主碑刻有中文、英文、泰文三種語言，朝東的側面另有主碑文的印尼文、越南文翻譯。西側面則列有二十六名罹難移工的姓名（圖 4-3），採羅馬拼音，很難分辨國籍。但從罹難名單說明只列了中文及泰文，大概可以推測得到亡者以泰國籍居多，主要是因為重大職災定義為一死三傷，營造業最有可能，而根據曹常成等（2007）分析移工重大職災顯示，泰國籍勞工就佔了 71.3%，這也許說明了為什麼移工碑在翻譯上特別偏重泰文。¹⁶

移工碑由紅棕色的花岡岩塑型而成，分成上下兩部份，上是六面菱形直立的主碑，下有四面方型的基座，字跡以淺刻燙金，部份字跡已有剝落不易閱讀。基座的正面及兩側面也同樣刻有悼念詩文，分別以泰文、越南文、印尼文擇一翻譯，三首詩都在強調台北的繁華與便利來自移工的付出，特別指出大樓建築、柏油路、捷運等建設成果，顯見死傷名單多在營造業。

台北市移工共計三萬六千餘人，多從事看護工或家庭幫傭工作，少部分從事營造業、製造業等危險性工作，其中又以泰國籍勞工最多。據統計，台北市自 1991 年起至 2006 年共有二十六名移工因職災死亡，市府主動設立移工工殤碑是為了喚起社會各界對勞安的重視，並加強推動勞動檢查（中國時報，2007）。

揭碑日選在四月二十八日工殤日，台北市政府表示，移工來自四面八方，紀念碑的造型即發想於此，而數首紀念詩文都來自勞工局的同仁撰寫，再翻譯成各國語言。典禮由台北市市長郝龍斌、勞工局長蘇盈貴主持，並邀請四個移工輸出國駐台辦事處的代表共同揭碑，步行至勞動文化園區的「許願池」灑下

16 這同時也顯現了，佔移工人數近四成的家務移工職災死亡並未被列入。因為 2003 年 SARS 風暴中，台北市和平醫院就有三名印尼籍看護工隨老人入院而被感染死亡，但這份名單中看不到。

玫瑰花瓣，為在台移工祈福（同上）。

移工碑位於承德路旁的勞動文化園區內，是一個半開放的園區，一般過往行人不太會從承德路轉進。但園區內有勞工教育館，故而平日入園參加勞教的工人，進出都可以看見移工碑。可惜的是，來台移工鮮少有機會來此接受勞教，應該也看不見這個難得刻有各國移工母語的工殤碑了。

（五）高捷紅線工殤碑，2008 年四月，高雄捷運獅甲站三號出口路側

高雄捷運於 2008 年清明節前夕，舉辦紅線工殤碑揭幕儀式。碑文特別追悼捷運紅線工程興建中罹難的七名工人，其中二名是泰國籍，這些工人多是因墜落工地、或遭飛落物體砸中而死亡。黑底燙金字的碑文（圖 5-1）如下：

高雄捷運工殤紀念碑

為了高雄美好的未來，在捷運的土地上辛勤耕耘。如今處處面貌一新，高雄已換上彩衣展翅飛揚。因捷運帶來的方便，子孫莫不引以為傲。您用生命開創了文明與進步，我們永遠深深感念。

王慶泉、黃鴻洲、張增川、黃海上、吳秀寶、通邦（泰籍）、阿敦（泰籍）

高雄捷運股份有限公司謹誌／中華民國九十七年元月

由捷運局長李正彬、勞工局長吳清賓、泰國駐台辦事處官員共同為工殤碑揭幕並獻花。捷運公司總經理范陳柏致辭時，特別強調高雄捷運靠著許多本地及外籍勞工辛苦的打拼，才能完成這一艱鉅又美麗的城市建設。與會人員默哀一分鐘，為所有因捷運工程罹難的勞工祈福，建碑以喚起注重工安，減少職災發生（大紀元，2008）。

中央社的新聞稿及其他轉載媒體，都將高捷紅線碑的設立地點，誤植為前鎮勞工公園內，故而一般人很容易將高捷碑與 2003 年設立於勞工公園內的全國工殤碑搞混。我在勞工公園尋找未果，就近詢問公園內勞工局育樂中心的員工，得到斬釘截鐵的答覆：「勞工公園只有一個工殤碑，沒有高雄捷運的紀念碑。」返回捷運站問捷運公司員工，更對工程死傷的歷史茫然不解。去電高雄市政府，無人知曉。最後經輾轉詢問高雄市產業總工會，總算在高捷紅線獅甲

站三號出口電梯旁的道路側邊，見到這個圓柱型的工殤碑。

高捷紅線碑由水泥基底、大理石材質構建而成，圓座方碑，碑面以三十度角仰面，紀念小廣場的週邊半繞著柏樹叢（圖 5-2、5-3）。此處位於人行絡繹不絕之處，碑座與碑文皆明顯可見——雖然泰籍工人名字的中文翻譯，顯然不是他們的全名。

四、結論：獲利的國際資本，受害的跨國移工

五個留下移工姓名的工殤碑，是台灣少數肯認移工貢獻的歷史見證。

台灣解嚴後的政治民主化歷程與社會運動興起，是移工工殤碑的重要背景。2002 年由工傷協會、工委會等勞工團體推動多年的「職業傷病勞工保護法」公布實施，第 39 條明訂四月二十八日為工殤日，立法說明文字且標示應設立工殤紀念碑。此後，相對擁有較高資源及政治敏感度的中央政府及北高二直轄市，便先後設工殤碑。至今找尋得到的五個移工工殤碑，台北市就佔了三個，新北市一個，高雄市一個。選址上，除了「四面八方碑」無特定災難事件指涉而設立在全市勞工局所屬的勞動文化園區內，其餘四個碑址大都與事故的職災地點連結，讓民眾在享用建設成果時，得以同時反思職災損害。

在文字呈現上，只有「外籍勞工工殤碑」及「信義快速道路殉職碑」出現移工母語，亡故的二名泰勞姓名以泰文刻在信義道路的殉職碑上，更是至今獨一無二。只是無法統計究竟有多少移工路經看見。至於雪隧、台北 101、高捷紅線三個工殤碑上的移工姓名，都以羅馬拼音或中文音譯表達，所預設的展示群眾還是只有在地台灣人。雖然多數的揭碑典禮都邀請了移工來源國的辦事處代表，只是不知道千里之外的移工家屬是否得知，在台灣的紀念碑記載了親人的姓名？他們會想來看嗎？有機會看到嗎？

工殤碑多來自災難。台北 101 的五名施作工人因地震自高樓跌落死亡，引起社會譁然，形成壓力才逼使勞資政三方共同協商，將所有參與興建大樓者的姓名共同列上，建立「伙伴碑」，因此勞工團體得以夾帶低階移工的姓名進駐這個台北地標最醒目的位置。北二高信義支線、雪隧、高捷都是國家公共工程，重要的交通便道，死亡移工與本勞併列，傳承自過往重大公共工程立碑追悼的

習俗，也反映營造業移工犧牲慘重，被遺忘的遠比被記錄的多太多。

另一方面，隨著台灣產業結構改變及人口老化的影響，家務移工與漁工的數字一再攀高，而營造業移工的引進卻大幅減少。¹⁷ 佔移工人數最多的製造業，職災死傷人員並無「工程結束」的時間點以出現紀念物件或儀式。可想見的，營造業工殤碑終究只是在台移工職災的冰山一角，更邊緣的家務移工、境外漁工、無證移工因無法可保，職災實況受到政策性的隱匿而無法被看見。

台灣營造業發展百年多以來，從清朝、日治、到國民政府來台，戰事人員多在承平時轉任國家建設的建商或勞工。鑿路、拓荒、搭建鐵路與水庫等重大公共工程裡，若非有殖民母國來的工程師或承包人員，就是跨海而來的軍隊轉任的外省榮民，因著這些連帶關係，工程結束後建碑祭祀，既是撫慰犧牲，也維持了政權擴張的合法性。陳佳利（2007a：215）研究當代戰爭紀念館多隱含國族認同的觀點，以哀悼受難者作為政治展示。戰爭的「衛國」與公共工程的「治國」有連續性的類推意義，故而在公共工程的工殤碑，多是伴隨歌頌工程成果同時出現，從日本殖民到戰後國民政府的國家治理中，使用的都是同一套「為國犧牲」的政治語彙，工程的職災因隱含在為建設國家而受難的政治展示之中。

台灣立法大量引進移工，始自承接國家建設的營造商對廉價勞力的需求，但外勞政策採取客工制度，將移工排除在歸化入籍之外，政策性地確定移工在台灣「經濟上被需要，但在政治上不被需要」的邊緣身分（曾熾芬，2004）。這麼一來，營造業移工死亡率雖遠高於平均值，但過往工程紀念碑所召喚的「為國犧牲」意涵就不堪沿用了。舊有的「國族認同」明顯不足以說明工地上無國界的勞動傷亡，且因降低工安成本而獲利的，早已是凌駕國家的跨國大財團了。

當然，主事者在建碑時並無意識背後複雜的政經意涵，碑文上也沿襲過往的肯認犧牲語境，並未傳達出真實世界的複雜變遷。只是，紀念碑傳達的主流

17 依勞動部統計，2002 年的社服外勞有 120,711 人，2017 年六月已有 242,121 人，增加整整一倍。漁工人數也從 2,935 人提昇至 11,597 人，而營造業（含重大公共工程）移工數則自 44,532 人急速下降為 11,165 人。人數最多的製造業移工則穩定攀升中。參見 <http://statdb.mol.gov.tw/html/mon/212020.htm>。2017/08/13。

歷史是一個面向，後人解讀、重構記憶的行動又是另一個拉鋸的面向。因此，研究並探討當代移工工殤碑的政治訊息，正是要顛覆工程成果的榮耀共享，指出碑文上沒被說出的利害關係：獲利的跨國財團並非公共利益，受害的東南亞移工也不是為國犧牲，營造工地上的勞資關係與階級壓迫早已跨越國界了。

探究移工工殤碑的基進政治性，就在於揭露全球化的不平等。過往近三十年來，台灣的國內法令因應全球化而調整，公共工程全面開放國際資本競標，致使資本流動不受國界控管以賺取最大利潤；相關的勞動法令則政策性壓低移工薪資及限縮其居留與工作權利，將來自東南亞的移工推向台灣最高工殤率的處境。當代工殤碑上的羅馬拼音姓名、碑文翻譯成東南亞文字，應該朝向反思不分國籍的勞動安全，才是在地社會最大的公共利益。



圖一：在台北 101 伙伴碑前面拍照的遊客

台灣各地的移工殉職碑：

(一) 信義快速道路殉職碑，2006 年 11 月，台北市中強公園東北側



圖 1-1



圖 1-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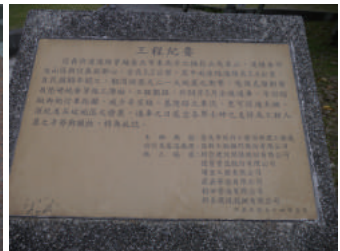


圖 1-3

(二) 雪隧殉職碑，2006 年 6 月，新北市北宜高速公路石碇服務區



圖 2-1



圖 2-2



圖 2-3

(三) 台北 101 伙伴碑，2007 年 4 月，台北 101 大樓至購物商場間信義路側



圖 3-1



圖 3-2



圖 3-3

(四) 外籍勞工工殤碑，2007 年 4 月，台北市承德勞動文化園區



圖 4-1



圖 4-2



圖 4-3

(五) 高捷紅線工殤碑，2008 年 4 月，高雄捷運獅甲站三號出口路側



圖 5-1



圖 5-2



圖 5-3

參考書目

- Halbwachs, Maurice. [1941, 1952] 1992. *On Collective Memory*. Ed. and trans. by Lewis A. Coser.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_____. [1950] 1980. *The Collective Memory*. Trans. by Francis J. Ditter & Ditter, Vida Yazdi. Haper & Row.
- Harvey, David. 2005. "Uneven Geographical Developments." *A Brief History of Neoliberalism*.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Sherman, Daniel J. 1994. "Art, Commerce, and the Production of Memory in France After World War I." *Commemorations: the Politics of National Identity*, edited by Gillis, John R., 186–211.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Benedick, Anderson。2008。《想像的共同體：民族主義的起源與散布》。吳叡人譯。台北：時報。
- Benjamin, Walter。2012。〈歷史哲學論綱〉。《啟迪：本雅明文選（修訂版）》。張旭東、王斑譯。324–338。台北：牛津。
- 大紀元。2006a。〈台工傷協會：雪山隧道職災死傷人數遭低估〉。2006年6月6日。<http://www.epochtimes.com/b5/6/6/6/n1341055.htm>。2017/03/22。
- _____. 2006b。〈北宜高全線通車 工程殉職紀念碑今揭幕〉。2006年6月16日。<http://www.epochtimes.com/b5/6/6/16/n1353123.htm>。2017/03/22。
- _____. 2008。〈高捷工殤碑揭幕 緬懷殉職勞工〉。2008年4月2日。<http://www.epochtimes.com/b5/8/4/2/n2068082.htm>。2017/03/25。
- 互助營造公司。2012。《台灣營造業百年史》。台北：遠流。
- 中國時報。2007。〈外勞工殤紀念碑取名「四面八方」〉。2007年4月29日。http://www.leaderex.com.tw/front/b3/b3_2-155.html。2017/03/22。
- 中華民國總統府。2013。〈2013年11月23日總統府新聞稿〉。<http://www.president.gov.tw/Default.aspx?tabid=131&itemid=31246&rmid=514&word1=%E4%BF%A1%E7%BE%A9%E7%B7%9A&sd=2013/11/22&ed=2013/11/24>。2017/03/21。
- 王汎森。1993。〈歷史記憶與歷史〉。《當代》91：40–51。
- 王明珂。1993。〈集體歷史記憶與族群認同〉。《當代》91：6–19。
- _____. 1997。《華夏邊緣：歷史記憶與族群認同》。台北：允晨文化實業。
- 仇佩芬。2016。〈訪視東南亞主題書店，馬英九：移工是朋友，沒有身分問題〉。《風傳媒》，2016年4月26日。<http://www.storm.mg/article/109465>。2017/11/11。
- 台北市勞工局。2010。《九年有成，詩懷久久（上）：外勞詩文選集合輯》。台北：台北市勞工局
- 成露茜。2008。〈移民／工發聲與媒體〉。《跨界流離：全球化下的移民與移工》。夏曉鵬、陳信行、黃德北編，頁129–159。台北：唐山。

- 江昱嫻等。2016。〈產業外籍勞工職業災害死亡事故衍生之勞保權益損失探討〉。《勞動及職業安全衛生研究季刊》24，1：1-24。
- 何培夫。2001。《台灣碑碣的故事》。南投：台灣省政府
- 吳乃德。2008。〈書寫民族創傷：二二八事件的歷史記憶〉。《思想月刊》8：39-70。
- 吳佳臻。2008。〈天生愛組織？菲律賓移工自主團體在台灣的組織經驗〉。世新大學社會發展研究所碩士論文。
- 吳挺鋒。1997。〈「外勞」休閒生活的文化鬥爭〉。東海大學社會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 宋家瑜。2017。〈集體勞動，集體創作：移工在臺灣的文學社團治動〉。《台灣文學館通訊》55：10-14。台南：國立台灣文學館。
- 李易昆。1995。〈他們為什麼不行動？——外籍勞工行動策略差別之研究〉。輔仁大學應用心理研究所碩士論文。
- 李雪莉等。2017。《血淚漁場：跨國直擊台灣遠洋漁業真相》。台北：行人。
- 金寶瑜。2005。《全球化與資本主義危機》。台北：巨流。
- 苦勞網。2007。〈101大樓因勞工才續紛 勞動伙伴碑點燈〉。<http://www.cooloud.org.tw/node/58275>。2017/03/22。
- 唐詩。2014。〈勉官員要有國際觀 馬總統：先對家裡外勞好一點〉。《民報》，2014年8月9日。<http://www.peoplenews.tw/news/8fb8d126-9ed3-4001-be6f-74f9041dc784>。2017/03/22。
- 張正。2008。〈全球化之下：新移民／工社群的跨界文化鬥爭〉。暨南大學東南亞研究所碩士論文。
- 曹常成等。2007。〈我國外籍勞工重大職業災害特性與災因分析〉。《工業安全衛生月刊》2007年6月份：9-25。
- 郭美瑜。2013。〈信義線明六時通車 公共藝術吸睛〉。《蘋果日報》。<http://www.appledaily.com.tw/realtimenews/article/new/20131123/297505/>。2017/03/22。
- 陳佳利。2007a。《被展示的傷口：創傷與記憶的博物館筆記》。台北：典藏。
- _____。2007b。〈創傷、博物館與集體記憶之建構〉。《台灣社會研究季刊》66：105-143。
- 陳金泉。2002。〈職業災害補償實務爭議案例解析〉。《政大勞動學報》12：425-455。
- 陳香君。2014。《紀念之外：二二八事件·創傷與性別差異的美學》。周靈芝、項幼榕譯。台北：台灣女性藝術協會、典藏藝術家庭。
- 曾國棟。2004。《台灣的碑碣》。台北：遠足文化。
- 曾熾芬。2004。〈引進外籍勞工的國族政治〉。《台灣社會學刊》32：1-58。
- _____。2006。〈誰可以打開國界的門？移民政策的階級主義〉。《台灣社會學研究季刊》61：73-103。
- 維基百科。無日期。〈雪山隧道〉，<https://zh.wikipedia.org/zh-tw/%E9%9B%AA%E5%B1%>

B1%E9%9A%A7%E9%81%93。2017/03/26。

劉梅君。2000。〈廉價外勞論述的政治經濟學批判〉。《台灣社會研究季刊》38：59-90。

藍佩嘉。2006。〈合法的奴工，法外的自由：外籍勞工的控制與出走〉。《台灣社會研究季刊》64：107-150。

蘋果日報。2004。〈北二高隧道工程坍塌 2 死：另 6 工人輕重傷馬英九趕赴現場〉。2004 年 3 月 24 日。<http://www.appledaily.com.tw/appledaily/article/headline/20040324/807537/>。2017/03/21。

顧玉玲。2008。〈勞動者的血汗印記：工殤紀念碑與歷史記憶〉。《台灣社會研究季刊》72：229-252。

_____。2010。〈自由的條件：從越傭殺人案看台灣的家務移工處境〉。交通大學社會與文化研究所碩士論文。

_____。2013。〈跛腳的偽自由市場：檢析台灣外勞政策的三大矛盾〉。《台灣人權學刊》2，2：93-112。

Construction Site without National Borders: Looking for Names of Migrant Workers on Monuments to Injured Workers in Taiwan

Yu-Ling Ku

Doctoral Student, Institute of Cultural Heritage and Arts Innovation Studies,
Taipei National University of the Arts

Abstract

Migrant workers undertake difficult, dirty, and dangerous jobs in Taiwan, and their mortality rate of occupational injuries is above average. Is their contribution recorded? By a study of relevant literature and a review of documents and on-site fieldwork, I discovered five monuments listing migrant workers' names since 1989, when they first came to Taiwan.

Through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Japanese colonization, and the ROC in Taiwan, monuments for workers who died on public construction sites were always accompanied by praise for the results of the project. Therefore, the previous monuments aimed not only to comfort the dead, but also to maintain the legitimacy of the expansion of the regime. Nowadays, the commemoration of migrant workers is a challenge to the political patriotic connotations of the monument as a "sacrifice for the country" since they are politically excluded from the national identity of Taiwan. Here migrant workers' monuments expose the inequality of globalization. Profits of transnational consortia are not in the public interest, and the death of migrant workers from Southeast Asian is not a "sacrifice for the country". Exploitation of labor has crossed national borders.

Keywords

migrant workers, labor monument, construction site, occupational injuries, collective memory
